

“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丛书

Serie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中国外交史 (从夏至清)

下册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China: from Xia to Qing

何新华◎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本书获得以下资助

暨南大学高水平大学学科建设项目

“华侨华人与国际问题”学科建设经费

暨南大学本科普通教材资助项目

“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何亚非

副 主 编：陈奕平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子昌 邓应文 代 帆 庄礼伟

李皖南 吴金平 张 云 张小欣

张明亮 张振江 陈 文 陈定定

陈奕平 曹云华 潮龙起 鞠海龙

总序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路精神凝聚了国际社会对倡议的共识。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形成共同发展、包容发展、共享发展的利益共同体，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中国对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新贡献，为应对“逆全球化”等新挑战提供的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全球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经过各国几年的合作努力，受到国内外官、产、学各界的高度关注，成果累累，许多研究成果也顺应时势，呈现在世人面前。

暨南大学素有“华侨最高学府”的美誉，在华侨华人研究和东南亚研究方面具有鲜明特色，历史悠久。1927年暨南大学设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聚集人才，系统研究东南亚问题和华侨问题，出版《南洋研究》《南洋情报》等刊物及多种专著，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大、成绩多、声名显著的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专门机构，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和学术影响。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后，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继续得到重视并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彰显“侨校”特色的两大研究领域。2011年暨南大学为打造具有侨校特色的创新研究平台，再次整合全校国际关系和华侨华

人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力量,成立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近年来,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支持下,暨南大学加大对华侨华人研究的支持力度,整合全校国际关系和华侨华人及其他相关领域研究力量,并联合国内外高校、机构、社团等力量,牵头成立了“华侨华人与中国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推动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的协同创新,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同时进一步强化特色研究,暨南大学依托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现有学科优势,于2014年成立“21世纪丝绸之路研究院”,与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实行“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运行模式,并以华侨华人研究、东南亚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与传媒研究、华文教育研究、国际经济贸易研究等特色优势学科为支撑,凝聚国内外丝绸之路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务实求精、合作共赢、包容开放的学术精神,致力于打造“一带一路”研究的学术平台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智库。

近年来,暨南大学结合中国外交,在“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2012年以来,发表论文近400篇,出版学术专著20多部,主持“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社会与文化基础研究”“东南亚安全格局对我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影响研究”“海外华人社区中华文化传承研究”“海外中国公民保护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10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9项,教育部重大公关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0项,省部级科研项目40项,已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近40项,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在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方面,积极提交研究报告,为党和国家建言献策;每年举办一场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和2~3次国内学术会议,并通过发行220多期的CSSCI期刊《东南亚研究》发表专栏文章,推动南海主权、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越南关系、东亚一体化、美国东南亚政策、华侨华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问题的探讨和学术创新;每年出版《世界侨

情报告》《南海地区形势报告》，介绍世界侨情和南海地区形势，形成了品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围绕国际热点问题撰写大量媒体文章，接受媒体采访，起到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培训大量地市处级以上侨务干部，获得学员广泛好评。暨南大学围绕华侨华人和国际问题的社会服务得到同行专家和教育部的肯定。2016年教育部对151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进行评估，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的社会服务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分别位列第26和第39。

“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丛书正是暨南大学上述科学的研究和社会服务体系及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荟萃。首批丛书包括《从参与全球化到打造共同体》《广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暨南观天下：华侨华人与国际问题评论》《马来西亚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等，涉及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中国和马来西亚与“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和国际关系热点问题的评论。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外交的相关研究，尤其是从东南亚和华侨华人视角对“一带一路”的深入研究。

何亚非

2017年6月

目 录

导 言 中国外交史学科刍议 / 001

第一章 夏商西周外交 / 031

第一节	夏商西周外交格局	/ 031
第二节	夏商西周外交思想	/ 038
第三节	夏商西周外交制度	/ 042
第四节	夏商西周外交政策	/ 050

第二章 春秋战国外交 / 064

第一节	春秋战国外交格局	/ 064
第二节	春秋战国外交思想	/ 069
第三节	春秋战国外交制度	/ 079
第四节	春秋战国外交政策	/ 083

第三章 秦汉外交 / 094

第一节	秦汉外交格局	/ 094
第二节	秦汉外交思想	/ 101
第三节	秦汉外交制度	/ 108
第四节	秦汉外交政策	/ 113

第四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外交 / 179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外交格局	/ 179
-----	-------------	-------

第二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外交思想	/ 192
第三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外交制度	/ 199
第四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外交政策	/ 206

第五章 隋唐外交 / 241

第一节	隋唐外交格局	/ 241
第二节	隋唐外交思想	/ 248
第三节	隋唐外交制度	/ 254
第四节	隋唐外交政策	/ 269

第六章 两宋外交 / 362

第一节	两宋外交格局	/ 362
第二节	两宋外交思想	/ 371
第三节	两宋外交制度	/ 379
第四节	两宋外交政策	/ 391

第七章 元代外交 / 445

第一节	元代外交格局	/ 445
第二节	元代外交思想	/ 451
第三节	元代外交制度	/ 456
第四节	元代外交政策	/ 460

第八章 明代外交 / 514

第一节	明代外交格局	/ 514
第二节	明代外交思想	/ 521
第三节	明代外交制度	/ 525
第四节	明代外交政策	/ 536

第九章 清代外交（一） / 645

第一节 清代外交格局 / 645

第二节 清代外交思想 / 651

第三节 清代前中期外交制度 / 661

第四节 晚清外交制度 / 675

第十章 清代外交（二） / 699

第一节 清代对传统属国的外交政策 / 699

第二节 清代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 / 768

第三节 清代对西域回部诸国的外交政策 / 784

第四节 清代对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 / 836

参考书目 / 879

索 引 / 901

后 记 / 912

第七章 元代外交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帝国，定都大都（今北京）。元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一统。在外交领域，元朝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海陆全方位开放、华夷一体的新局面。

第一节 元代外交格局

一、元代疆域

公元 1260 年，忽必烈即大蒙古国汗位，建元“中统”。至元八年（公元 1271 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对于“大元”的含义，文献解释说：“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盖闻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也，以为昔之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①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元军攻占临安，南宋覆亡。至元十六年（公元 1279 年）崖山海战后，南宋残余势力被完全消灭。

蒙古部落兴起时的人数不过百余万，成吉思汗去世时，遗留的全部兵力也只有十二万余。^②而成吉思汗和其子孙建立的蒙古帝国包括中国本土的元朝以及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四大汗国，其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到巴尔干地区，北起西伯利亚，南到中南半岛，总面积约三

① 《经世大典序录·帝号》。

② [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上卷），冯承钧译，上海书店 2001 年版，第 179 页。

千多万平方公里，征服的版图涵盖今天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包括中华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罗马文明体系下的诸多古国。

元朝中国作为各蒙古汗国的宗主国，其疆域如与其他汗国相比，尤为广大。元朝中国划分为中书省、十个行中书省，以及宣政院管辖的西藏地区。中书省直接管辖首都附近的“腹里”地区，范围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宣政院（初名总制院）管辖吐蕃地区（今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等地），十个行中书省分别为陕西、辽阳、甘肃、河南、四川、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和岭北。

元朝在东北设置辽阳行省，其地“东尽辽左”，东南与高丽接壤。两国边界在一百年间变动不居。至元十二年（公元 1275 年），元朝升东宁府为东宁路，两国边界在慈悲岭（今朝鲜黄海北道中部）至铁岭（今朝鲜元山南）一线。至元二十七年（公元 1290 年），随着元丽关系的改善，元廷将东宁路辖地归还高丽，原割隶婆娑府的静、义、麟三州及威远镇（均在鸭绿江下游东岸）也一并归还，两国疆界大致恢复辽、金迄元初的状态：西界以鸭绿江下游为界，东北边界则由铁岭变为双城（今朝鲜永兴）。元末，高丽趁元朝内乱不断，恭愍王于至正十六年（公元 1356 年）出兵攻破双城，双城所辖登州（今朝鲜安边）以北、定州（今朝鲜定平）以南地区划入高丽版图。高丽乘胜再向北扩张，在东北方向先后占领定州、咸州（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咸兴）、三撒（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北青）；西北方向则夺取泥城（今朝鲜平安南道的昌城），元丽边界最后确定在三撒至泥城一线。

元朝北疆继承自大蒙古国，大致分布于唐努乌梁海、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及其西面地区。西北边疆在至大元年（公元 1308 年）后，以阿尔泰山东部的称海（又名镇海，今科布多）宣慰司辖境至哈密一线为分界。

元朝西疆位于吐蕃边外。吐蕃西北隔山与旭烈兀所属的怯失迷儿（今印度、巴基斯坦境内）、巴达哈伤（今阿富汗境内）相对，其北则隔昆仑山与察合台汗国相邻，南与尼波罗（今尼泊尔）交界，东南与天竺、蒲甘（今缅甸）接壤。

元朝西南边疆位于云南、广西的外围。云南行省的西部与蒲甘接壤。云南西界推至太公城到江头城一线，即今缅甸实阶与曼德勒之间。云南的

西南、南部,与车里、八百媳妇(今泰国清迈)和老告(今老挝)接壤。云南的东南则与安南交界,其中临安路的蒙自县、建水州以及哈迷部军民万户的舍资千户(后改安南道防送军千户,今蒙自老寨)、纳楼部、王弄山、大甸、七十城门甸,广南西路(原宋朝特磨道)的富州以及宁远州等地,与安南归化江路、陀江路和宣化江路相邻。另外,广西两江道的镇安路(归顺州、养利州)、太平路(下雷州、安平州)、龙州万户府(上、下冻州,罗回峒)、思明路(思明州,上、下石西州,西平州、思陵州、禄州、上思州、永平寨、凭祥峒)等地,与安南谅州江路交界。

元朝东南疆域达海,建有琼、崖、儋、万“海外四州”(今海南岛)及“澎湖巡检司”。漳、泉、兴、福四州界内的澎湖诸岛与琉求(今台湾岛)隔海相对。元朝举行四海测景,曾在今南海地区设测景点。

元代是中国王朝疆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对于元代疆域,元朝官修文献盛赞:“至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署、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何可胜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矣。”^①明代所修《元史》也承认元代疆域超越汉、唐: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②

元代建立起的广大疆域不仅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割据,而且继承汉、唐以来的中国版图,重新创立了新的大一统格局。对此意义,有学者评论:

回过头来说,自金与南宋对立算起,业经大约一百六十年。若自公元九〇七年,也就是与唐朝的灭亡同一时间,自称“皇帝”的契丹耶律阿保机与

^① 《经世大典序录·君事》。

^② 《元史·地理志》卷五十八,列传第十。

后梁朱全忠这“两位皇帝”开始的契丹帝国及五代、北宋政权的南北对峙通算的话，中国是睽违三百七十年再度整合。如果追溯到重视“统一”现实面的唐玄宗时代来考虑的话，竟然是相隔五百三十年的整合了。^①

元朝疆域也不同于汉、唐，元朝统治集团以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因此，边疆地区以及前代有统治之名而无行政之实的所谓羁縻地区都纳入了正式的统治区域，这是中国边疆地缘政治史发生的最重大变化之一。在元朝统治范围内，在蒙古、辽、金、西夏和宋的疆域基础上，再将大理国改为云南行省，将吐蕃纳入宣政院辖地，将东北极边诸族纳入辽阳行省辖治，将西伯利亚大部纳入岭北行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越过黄河、长江流域汉人传统统治区域的多民族帝国，将几千年来东亚大陆持久对抗的草原、农耕世界整合在了一起，实现了华夷一统局面，这些对中国疆域的奠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元代外交格局

1. 元代建立起第一个全球规模的世界体系

元代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世界体系，范围囊括亚、欧、非三大洲的所有核心地区。蒙古力量狂飙突进，冲破当时世界上的各种文明、宗教和种族壁垒，将游牧、农耕和海洋三个相异世界有机整合成一体，^②连接起了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印度教文明，创建了有史以来人类最为广袤无垠的超级大帝国，也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欧大陆、衔接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的世界体系，出现了“蒙古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一种在广阔地域内提供公共品、空前的大一统的世界政治秩序。

元代建立起的世界体系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由元朝与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的关系构成。四大汗国与元朝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特殊关系。在元朝与四大汗国统治的广大地域内，从

^① [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页。

^② [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前此疆彼界尽被扫除，众多驿路相连互通。元人形容其时“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① 第二层次由元朝与属国的关系构成，包含高丽、安南、占城、爪哇等国，这些国家向元朝称臣纳贡，在政治、经济方面与元朝有紧密关系。第三层次由元朝与外围国家的关系构成，诸如马八儿、俱蓝等，这些国家遣使通元，不过是与元保持外交、商业上的联系而已。

2. 元代世界体系的意义

元代世界体系是在破坏旧世界的废墟上重新整合建立起的新秩序，因此其意义具有双重性。^②

一方面，元代建立起的蒙古式世界体系给当时世界地缘格局带来巨大破坏，几千年来人类原有的国家秩序被击碎，“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征服战争震撼整个欧亚大陆。前后八十年间，蒙古兵锋所指，东及日本，西达中欧，北迄西伯利亚，南至爪哇、越南、缅甸，因而创建历史上幅员最为广大的陆上帝国。蒙古统治中国、中亚及波斯约达百年之久，而俄国处于所谓‘鞑靼枷锁’之下近二百年。”^③ 亚欧大陆上无数具有悠久文明传承的皇帝、国王、算端，成为蒙古大汗、汗王们的囚徒，旧世界固有的地缘格局被蒙古铁骑冲击得七零八落。蒙古帝国被西方视为“世界之鞭”和“黄祸”。格鲁塞认为，“成吉思汗被看成是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是十二个世纪中草原游牧民对古代定居文明入侵的典型。确实，在他的先祖中不曾有人留下了如此可怕的名声。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④ 至今，仍有学者对成吉思汗征服中的屠杀、把耕地变牧场等政策予以严厉批评，认为蒙古统治者在社会政治领域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是对宋代中国等文明社会的逆转。^⑤ 有学者甚至认为，元朝在中国境内建立的统治为殖民政权性质，“源自草原的制度与观念（如蒙古封建与家产制度[patrimonial feudalism]及政权为黄金氏族成员公有的观念）未被根除，而与承袭自中原的各种制度

^① 王礼：《麟原文集》卷六《义冢记》。

^② 马克思在1853年《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一文中认为英国在印度具有“破坏”亚洲旧社会和“建设”新式西方世界的双重使命，对元代世界体系的评估也应作如是观。

^③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④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17页。

^⑤ 周良霄等：《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如官僚制度及君主集权制度）相互抵牾，冲突不断，以致元朝未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原政权。直至最后，元朝仍带有殖民政权的性质”。^①

另一方面，元代开创的世界体系对中国与世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对于中国而言，元代世界体系将汉代以来各朝开创的对外海、陆交通格局推向了历史的顶峰。汉朝开辟了经过西域通向西方的陆上交通线，同时初步探索了经南海前往西方的航线。但8世纪中期爆发的安史之乱以及随后西域的动荡，使中国通往西方的陆上道路渐趋衰落，而海上交通道路则日益兴盛，到宋朝已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主要海上交通线。元朝不仅继承了汉、唐和宋的对外交通线路，也有自身开拓的对外交通线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海、陆两个方向上同时发展的朝代。各种文献中记录的与元朝有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在两百个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布在中亚、西亚、欧洲、北非、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前代没有记载的。15世纪郑和七下西洋，被称作中国远洋事业的创举，而元代的海外活动为郑和航海从人员、技术和知识方面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若无元代繁盛的远洋事业，明代郑和下西洋将无从实现。

对于世界而言，元代世界体系开启了全球化的早期时代。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认为，13—14世纪因蒙古征服出现的世界和平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觉醒，奠定了现代社会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制度基础。在欧洲，自蒙古入侵五十年以来，众多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的文明融为了一体，有了统一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在亚洲，中国传统的抑商政策被蒙古人彻底打破，中国的工场不仅要为世界市场生产传统的中国瓷器、丝织品，还要为专门市场增加全新的品种，包括为欧洲制作刻在象牙上的圣母玛利亚像和幼年基督像。^②两个世纪后欧洲人盛称的达伽马航海亚洲，也不过是沿着蒙古时代由阿拉伯人早已开辟出的航线航行而已。此后，无论是俄罗斯帝国，大明、大清王朝，还是西方人的海上帝国，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蒙古帝国的精神、视野。蒙古时代成了世界历史走向全球规模发展的转折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一书因对欧洲以外知

^①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页。

^② [美]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之形成》，温海清、姚建根译，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识的局限而把世界体系的源头与近代欧洲发展相联系,可能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表现。

第二节 元代外交思想

一、新型华夷观

1. 传统华夷观的颠覆:元朝“内北国而外中国”思想的出现

元朝在文化方面实行多元并存、兼收并蓄的政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同时盛行。元朝在确保蒙古人至高地位的基础上,对境内不同的宗教、文化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优容不同宗教,利用其影响力辅助蒙古巩固在各地的统治基础,忽必烈认为,“全世界崇拜的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①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思想使元代外交不以单一的意识形态划界,而执行多元、包容、融通的外交政策,从而形成了元代宏大外交格局的基础,使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受到极大冲击,“13世纪初,新兴的蒙古势力抬头,并最终灭掉南宋,统一中国,建立元朝。自此,中华与夷狄的地位完全逆转。中华处于夷狄统治之下,这是史无前例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②最初的蒙古统治者中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将汉人驱赶出居住地,“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③元朝规定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的制度,使文化上向来具有优越感、坚持以华夏为中心的儒家理论“内中国而外夷狄”改为“内北国而外中国”:

呜呼,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尔。公则胡越一家,私则肝胆楚越,此古圣人所以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也。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

^① [法]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5页。

^② [日]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王晓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③ 《元史·耶律楚材传》卷一百四十六,列传第三十三。

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透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①

对于这一局面，卫道者们惊呼“天地翻转”“冠履倒置”。对于蒙古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力，黄宗羲认为：“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又指出，“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②王夫之也认为“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③

2. 郝经、许衡的新华夷观

为了较好地适应元朝混一南北的政治需要，也为了调适传统华夷观面临的挑战，元代出现了以郝经、许衡为代表的新型华夷观。

郝经（公元 1223—1275 年），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家世业儒。郝经把宋儒“道”“道统”和“君统”等理学概念引入华夷观中，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④“中国之道”就是圣人之道的代名词，“中国之主”则是中国正统君主的简称。无论汉族、女真、蒙古的统治者，只要能重用士大夫，只要能行圣人之道，就可以达到“道统”和“君统”的合一，就可以成为中国“正统”的君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王朝的“正统”即合法性不是来自种族血统，而是与统治者能否将“道统”与“治统”相统一有关。

许衡是另外一位提倡新型华夷观的人物。宪宗四年（公元 1254 年），许衡应忽必烈之召，担任京兆提学，中统二年（公元 1261 年）后又任国子祭酒和中书左丞。至元三年（公元 1266 年）四月，许衡在《时务五事》中说：“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国朝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⑤这里的“汉法”，就是“中国之道”和“中国之法”的同义语。许衡提醒蒙古统治者，王朝要获得长治久

^① 叶子奇：《草木子》，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47 页。

^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③ 王夫之：《宋论·恭宗、端宗、祥兴帝》卷十五。

^④ 郝经：《陵川集》卷三十七《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⑤ 许衡：《鲁斋遗书》卷七《时务五事》。